



月河漫笔

峰回路转

——中国经济发展报告

朱荣林 著

学林出版社

朱荣林
著

峰回路转

——中国经济发展报告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峰回路转: 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朱荣林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80730-282-7

I. 峰… II. 朱… III. 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6134 号

峰回路转

——中国经济发展报告

作 者 朱荣林

责任编辑 林震浩

封面设计 周剑峰

责任监制 应黎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1.5 万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730-282-7/F·32

定 价 29.00 元

序

近一个时期以来,国人似乎正在动摇其宠辱不惊的常态,十分在乎于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的评头品足。当国际权威媒体频频发出《这是中国的世纪》、《一个崛起的新大国》的惊呼时,国内主流媒体迅速作出“这是别有用心的捧杀”之警惕性回应。而当全球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兰德公司推出《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的报告之后,又被国人喻之为耸人听闻之作。这种浮躁的心理,折射出国人对传统发展模式思维的路径依赖。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的赞誉性判断,其主要依据还是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些数据甚至令美国一位教授作出过“中国是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经济增长不但没有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剧,相反缩小了贫富差距的国家”这一我国学术界普遍相左的结论。这种决策系统有效性与信息系统可靠性相背离的现状,其源盖出自在政府非经济行为干预模式之下,我国信息数据长期失真之故。至于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前景所作的悲观性预测,更多的是基于对我国经济潜力的功能性判断,重在看本质、看变数。而国人对经济前景的预测,往往会基于对经济潜力的形态性判断,重在看现象、看增量。前者判断依据的重心集中在我国银行系统运行效能、老龄化负荷的承受能力和国有资产流失机制的纠正力度等。两者根本差别在于现代发展模式视野与传统发展模式视野之异,前者追求资源配置效率,后者追求资源供给规模。

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转型,几乎成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同选择,但由于路径的差异,产生过不同的效应。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外部移植型的转型模式,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经济衰退和波动;而我国采取的内外磨合式的转型模式,则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历经26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GDP总量已位居全球第四,进出口

贸易总量已名列世界之三,创造了年均 GDP 增速超过 9%的世界之最。但是,这种以有形要素不断扩张、资源储备加速耗竭、环境条件日益恶化为代价的增长,并非是一种良性的内生性变量的增长,其持久性堪忧。著名的《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生效,其划时代意义在于终于建树起一块国际环境外交的里程碑,彰显了人类社会对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展模式深刻反思的巨大成果。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签约国的中国,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13%,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其庞大的新建 562 座电厂(占全球新建总数的半数左右)计划和“世界加工厂”(正在导入的钢铁等企业 50 年内将不会迁走)的发展大势,正在不断地激增排放量而使自己被动地处于国际社会施加强大压力的指向地位。从此意义上判断,《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计划已成为推动我国发展模式转换的经济全球化力量。面对就业和环境双重压力的中国经济,其发展模式必须逐步改弦更张,将导向性考核指标重点设定在单位要素产出率、单位产出能耗率、新生产手段采用率、贸易条件优化率和就业岗位增长率之上。

发展模式变迁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种历史性阶段的基本标志,是由于资源储备结构与生产结构发生错位,资源约束程度与资源配置效率发生背离,公共权力结构与公共服务需求发生脱节,最终导致经济走向低效、社会走向不和谐、生态走向失衡。发展模式由一组多重行为模式复合而成,它涉及到制度层面、价值层面、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行为模式之间又构成互为前提、互为关联和互为因果的网络结构关系。以资源配置模式为例,其变迁的结果能提高效率,但无从解决公平,能提高资源生产率但无法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政府管理体制模式的变迁,其目标管理就是要弥补这种缺陷。

据此判断,发展模式变迁的价值取向可以归结为下述方面:一是要素地位面临重新调整。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将从以要素增量投入为主,走向以创新推动为主,前者以扩张有形要素(如土地、资金、原材料、能源等)增量投入为目标,后者则以扩张无形要素(如技术、管理、人才等)增量投入为目标。主导要素地位的更替标志着我国将要从一个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一个人力资本强国,从一个复制落后技术为主的大国走向一个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国,从一个对外经济高依存度的

大国走向一个自主贸易的强国；二是资源利用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资源配置方式不断转变的前提之下，我国将从追求资源供给高扩张，走向追求资源利用高产出；从资源无视时间维度的配置，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配置。在长三角地区建设用地指标仅剩余 8% 的约束条件下，土地产出率不可能长期维系在每公顷 149 万元人民币的产出水平上。为此，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水平扩张走向垂直扩张，经济效益获取的主渠道要从一次性效应走向乘数效应，产业管理要从结构升级为主走向结构升级与组织优化并重；三是政府管理体制进入重大变革。政府职能的重心要从领导为主走向服务为主，行政重点从经济为中心走向社会为中心，行政范围从全能型走向有限型。政府行政方式则要相应从传统行政走向依法行政，从暗箱行政走向透明行政，从高成本行政走向低成本行政。公共决策系统要从政府为主导走向社会为主导，公共资源配置要从个别选择走向公共选择，信息管理要从为政治决策服务走向为经济决策服务。

从全球价值链位置上判断和人均国民财富水平角度评估，我国充其量还只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而非一个经济强国，其源在于发展模式的落后。未来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不仅要应对极其沉重的债务链，还将面对大部分资源严重短缺的局面，更要直面日趋恶化的环境容量。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将是顺应时代潮流，加快发展模式变迁，舍此别无他途。

朱荣林

二〇〇六年八月于荣竹斋

目 录

序.....	1
一 发展模式篇.....	1
人类理智的选择.....	2
成为关注焦点的增长方式.....	7
人地矛盾的天平	17
政府靠什么行政	21
国以民为本的模式	25
似曾相识的体制改革	33
老百姓“救命钱”能投资吗	42
没有疗法的休克与没有休克的疗法	49
从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说起	54
要为宏观政策把脉	61
经济规律的社会逻辑	81
经济大潮鉴荣辱	94
亡羊必须补牢	97
二 产业结构篇.....	101
如何选择主导性产业.....	102
供求关系变动告诉我们什么.....	118
月亮走,我也走	136
虚拟企业走向全球.....	157
寻找经济增长的空间.....	164
一种具有双重属性的产业.....	169

一步行动胜似一打纲领·····	173
重新认识总部经济·····	177
水平扩张走向垂直扩张·····	18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98
文化理念的力量·····	213
三 增长机制篇·····	217
时代潮流的引领者·····	218
主导要素为何要易位·····	223
竞争力重点在转移·····	233
障碍来自四大不对称·····	242
给企业创新打分数·····	246
磁悬浮“悬”在哪里·····	256
四 区域互动篇·····	261
谁为谁服务·····	26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268
慎提“世界第6城市带”·····	280
换个角度看长三角·····	287
区域一体化概念的嫁接·····	293
是“战国时代”，还是“整合时代”·····	298
中心的地位不能自封·····	301
国际竞争力强弱谁说了算·····	310
秀才碰上兵·····	318
参考文献·····	321
后记·····	325

发展模式篇

其公共事业大受挑战。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其影响将更加严重。如果人类不采取行动，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2-4.5℃，极端天气事件将更加频繁。海平面上升将威胁沿海城市，农业和生态系统也将受到严重影响。此外，水资源短缺和土地退化也将加剧。面对这些挑战，人类必须采取集体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森林和海洋生态系统，并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基础设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并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宜居的家园。

严峻的形势客观上已经限定了人类完成这种转变的时间：我们必须改变自己与自然界进行能量、物质交换的传统模式，给自然界再生过程以足够的时间，去医治人类给地球留下的创伤，以及大自然的报复给人类造成的伤害，从根本上优化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人类理智的选择

13 年之前的 1993 年 10 月,我应美国华盛顿乔治顿大学公共政策系时任系主任考林·凯姆贝尔(Colin campbell)教授之邀前往该校讲学,曾作过《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发展、环境、安全问题的学术探讨》为题的讲演。当时我说,现代人类的行为对地球生物圈(biosp here)的自然过程进行着越来越粗暴的干预和破坏,使世界生态形势已经被逼到这样的临界线:或是人类继续我行我素,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形式都将为世所弃,永远沦丧;或者人类在深刻反思与内省的基础上,改变观念和态度,高度控制自己的行为,不断优化自己的决策,使人类的一切活动不超过大自然所允许的生态限度。这一转变过程是十分艰难的,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人类社会内部,以至各国内部的纷争,以及人类身临困境所发生的频频剧痛和阵阵痉挛。然而,实现这一个过渡是紧迫的、不容延宕的,严峻的形势客观上已经限定了人类完成这种转变的时间:我们必须改变自己与自然界进行能量、物质交换的传统模式,给自然界再生过程以足够的时间,去医治人类给地球留下的创伤,以及大自然的报复给人类造成的伤害,从根本上优化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实际上,早在 30 年之前,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已经提出了一份极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一时间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历史似乎正在验证其闪光的警示,即外延式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地球资源的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承受力。有人比喻,20 世纪文明是在石油的海洋上筑起的楼阁。这是因为,以煤炭、石油为动力源的扩大再生产,导致其储藏量逐年减少,地球的生命资源正在耗尽。据世界石油矿业联盟 1995 年的评估,地球石油可开采年数仅存 41 年。另一方面,由于石油需求量激增,其

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翻番,100年来地球温度已上升3摄氏度,其持续趋势将使东亚北纬45度以北的海上气温明显上升,尤其是临近北极堪察加半岛的白令海峡,每年一二月份气温将上升10摄氏度。2006年暑期,全球面临酷暑难当的境况便是其长期作用的必然结果。地球变暖的严重恶果还在于全球气候异常变动、热带雨林加速消失、沙漠化土地迅速扩大、海平面逐年上升、洪水不断泛滥。

面临地球生态的严重危机,“地球环境经济人”的概念应运而生,以对“理性经济人”的时代性纠偏,旨在为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的稀缺性之间构架协调之桥。杨利伟驾驶神州5号遨游太空所拍摄地球表面的夜景照片,肯定远不止记录我国沿海地区的辉煌。这种通宵达旦的景观所表现的人类热情,令人不禁想起在蒸汽机诞生之前世人对“永动机”的追求。世界500强及其赞美者们似乎认定,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所消耗的能源,其总和是没有界限的,是可以超越的。换言之,地球资源是永远可以满足人类需求的无限性。这种理念,犹如不承认蒸汽机在使热转换为动力过程中,其工作量是有限界的一样,正在支配无限制扩大人类经济活动空间的行为,其代价是正在快速改变地球的物理、化学以及生物环境。而这种改变过程,最大的伤害对象往往是对GDP增量“饥不择食”的发展中国家。英国卫报2004年9月20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英国新的垃圾场:中国》。文章披露,在英国地方当局、超市、企业收集起来准备再处理的废纸和塑料制品中,有1/3以上在人们不清楚其对环境和社会造成多少损害的情况下,送到8000英里之外的中国。根据政府的最新统计数字,每年出口到中国的塑料垃圾高达20万吨,废纸和硬纸板多达50万吨。英国《卫报》的调查表明,一些中国公司的代理商正在购买并出口成千上万吨未经洗涤的空塑料瓶、容器和其他家庭垃圾。在英国,大约有300家公司在收购垃圾,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公司。由于中国代理公司以高价收购(每吨混合塑料瓶开价120英镑,高于英国当地收购价的50英镑),且不管其是否污染环境,一概统收的做法,迫使许多英国老牌回收企业面临倒闭。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不断地加速河海结合部及海陆结合部的开发力度,使之成为地球排放废物的出口地。一种湿地类型的红树林正生长于此,其神奇的生态功能既能对流经的水体中的有机物和污染物进行过滤,可以大大减缓有害物质通过植物链向其他海洋生物及人类

传递的速度,还能减缓海啸推进的速度,为人类求生赢得宝贵的时间。但由于大规模经济活动干预的人为破坏,这种树林消失得很快,仅我国福建省福鼎县到海南岛南岸的红树林面积已减少近 70%。有专家估计,如果当年泰国南部能保留大面积红树林的话,则 2004 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造成的损失可能减少 1/3。大凡自然灾害的灾害系数被放大,其源盖出于人祸。

经济全球化正在从两个方面对中国经济施加影响:一是外资的大规模导入,在不断扩张中国经济规模的同时,正在加剧资源的消耗和环境容量的恶化;二是经济理念的潜移默化,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人们正在义无反顾地向大自然索取。其后果之一是资源加速枯竭。从 1990—2001 年的 10 年间,我国石油消费量增长 100%,天然气增长 92%,铜增长 189%。而我国的石油储藏总量仅占全世界的 1.8%,天然气占 0.7%,铜矿所占比重不足 5%。我国的单位产值耗能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2.4 倍,而生产总值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却是美国的 61 倍,日本的 68.7 倍。变卖祖宗遗产致富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大的一种经济行为。于是在地方政府政绩工程的驱动下,我国森林资源面临着旷古未有的危机。据统计,从 1999 至 2003 年的五年间,我国有 1 010.68 公顷林地被改变用途,每年有高达 7 554.21 万立方林木被超限额采伐。以四川省为例,由于森林采伐给政府每年带来的 12—13 亿元的财政收入,其惨重的代价是 1998 年特大洪水的 1 600—2 000 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其二是环境容量的安全日益受到威胁。承担着沿黄河地区 50 余座大中城市和 420 个县域的城镇居民生活供水任务的黄河,却吸纳着沿河地区每年排入的 60 亿吨污水。由于植被大面积的破坏,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45 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70%,导致沙漠化加剧、河床高筑、入海泥沙日增。据有关研究部门证实,长江沿岸 394 个主要排污口排放的污水,半数以上尚未达标;长江干流的水体已有 65% 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每年排入长江的污水已高达 200 多亿吨,占全国的 40% 以上;其中占全国国土面积不足 0.38% 的长三角地区太湖流域,其污水排放量已占全国的 10%。经济繁荣的难言之隐,真可谓几多欢乐几多愁。上海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历届政府的饮水问题,总算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起将取水口从黄浦江上游移至长江口,其指导思想是认定长江自净能力比黄浦江强。但按照国际通用的“污

水不超过流域总水量的1%”之标准计算,长江已经难以“洁身自好”了。因为,按总水量推算,长江只能消解净化92亿吨污水,但目前长江干流的排污量已经高达153亿吨。

在倡导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知能有多少决策者意识到生态全球化的意义。全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的一个直接恶果是,全球气候反常,自然灾害频仍,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自然发展史告诉我们,大约在46亿年前,地球和太阳系同时诞生。亿万年来,经过不断的演化,在浩瀚的太阳系之中唯独地球上有了三态的水,形成保护生命的臭氧层(正在受到氟利昂的破坏而出现空洞),导致弱化了太阳紫外线强度的阻挡。于是,地球成了太阳系的宠儿,30多亿年前首先在海洋中萌发了生命,继而生命从海上登陆,使大地披上了绿装,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到了距今300—500万年前,大自然终于产生了人类,人类也从此拥有了地球。人类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智慧生物有目的地作用于自然过程的开始。但它毕竟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无法脱离生物学上的基本生存条件,诸如空气、水分、食物和阳光等。人类之所以同其他生物不同,就在于其同时具有两种属性,进而导致人类行为的两重性:一是人类需要依赖并利用自然资源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其过程隐含了“适者生存”的天性,充满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二是人类又可以通过理智来控制这种竞争,采取适当的利益让渡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利益。因此,近几百年来不少有识之士曾为此而不断地发出呼声,但在急功近利盛行的年代里,这种呼声显得十分微弱,几乎没有被世人所注意,以至于传统发展模式在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护驾”之下越走越远。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原理作为市场经济法则的支撑性理论,其旨在用最经济的模式去调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和地球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其基本手段是运用模型的方法,将不属于经济范畴的命题全部排除在外,而将与经济相联系的一切相关因子全部简化成数字关系,进而抹杀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未来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全身心所关注的只是一个命题,就是财富,即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保护。至于财富是什么,他们并不关心。对“富”的不同解释,折射出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品和饮料,不是出自商人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他们为追求私利,关心经济

活动的效用和利益最大化。亚当·斯密对“富”的解释中折射出传统经济学的逻辑,即追求财富除了需要动机(私利)和途径(资源最佳配置)之外,并不需要考虑后果(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索迪则认为,所谓“富”不过是对自然的负债而已。换言之,既然是负债,就不算是“富”,而负的债还应还。

因此,围绕经济发展模式,始终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主张走内源式发展之路,构筑收缩型社会;另一种则主张走外延式发展之路,构筑扩张型社会。我国长期以来信奉外延式发展模式,启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亚四小龙经济崛起之鉴,即在国家集权主导下,通过引进大量外国投资,以高出口率推动本国经济快速增长,实现经济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但是,正是这种发展模式诱发了一系列危机,即资源无节制地低效利用、环境容量日益恶化、社会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基础被动摇、社会与政府的关系对立等。这种国家主导型、外资依赖型、出口带动型的发展模式,由于资源条件、环境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代之以起的应当是社会主导型、内需依赖型、进出口互动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与这种新型发展模式相联系的社会形态将是一种节约型和收缩型社会。法国思想家杰克·埃疏卢1981年提出收缩社会的本义是基于“财富积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是以自然和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考量。他在《为了收缩社会》一书中将收缩增长解释为是一种放弃了“为增长而增长”的发展模式,但并非指“负增长”。这种收缩涵盖了公共权力结构的优化、社会成本的调整和发展理念的升华。总之,未来世界将进入一个发展模式大幅度转换的时代,届时与之相适应的认知理念、价值取向、决策思想、政府体制、运作机制和政策法规均会逐渐峰回路转。

成为关注焦点的 增长方式

发展模式的变迁是一种全方位的经济管理行为转变,它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变和政府职能与行政方式的转变。从相互关系判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核心,资源配置方式转变是前提,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变是基础,政府职能与行政方式转变是保障。

我们之所以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视作发展模式变迁之核心,一方面是因为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几乎是全方位的,它包括了“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因而多数经济学家主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去考察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尽管这种考察过程存在某些缺陷,诸如要素投入与生产率之间缺失内在联系,但人们仍然将 TPP 对经济的贡献率所占据的地位来判断经济增长的性质是粗放还是集约。

一、要从多重变迁视野把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

首先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还是集约,实际上是反映了资源利用是否具有合理性、科学性与效率性,即稀缺资源是否流向重点发展领域,有限的资源配置能否提高产出率和降低物耗率。这些标准均与资源配置方式相联系。历史的经验证明,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水平和效率,但其基本条件有三:一是要建立全国统一、规范、有序的大市场,而非地区和部门人为分割的条块市场;二是要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使企业能直面市场竞争;三是强化市场的有效性,使市场的形态建设与功能建设相一致,力求做到企业进退市场成本低、市场对称性强、法制严明。上述三大条件的创造,有利于健全要素市场体系、完善各类市场的空间布局和均衡发展,以促使

各种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保证市场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市场的有效性还有利于价格、汇率、工资等导向信号的强化,提高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资源的流向及其流量能根据导向机制的作用发生变化。唯此,资源流向才能有利于确保重点产业的发展,才能确保经济持久、有效益地增长。历史的经验还再一次证明了有效市场配置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普瑞尔曾用西方国民账户对计划经济国家的资料进行重新整理,与市场经济国家作一比较;比较时段是1950—1970年的30年间,比较的国家是前苏联和东欧的7国与美国、日本等21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从静态效率比较,还是从动态效率比较,市场模式国家的效率明显高于计划模式国家。尽管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发育尚不够完善,但将市场化改革的前后作一比对,其效率变化也不容小视。据卢中原等测算,1979—1992年间,我国GDP增长中约有14%源自市场化改革的贡献。实践证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优化了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和组合规则,进而提高了资源的产出效率,即经济增长水平。

其次是主导要素的更替。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所决定,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我个人认为,通常说来,工业化进程的早期,劳动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因此相对而言,产业格局为“一、二、三”;当进入工业化中期,资金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工业产值比重迅速扩张,产业格局转变为“二、三、一”;当进入工业化后期之后,技术要素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其产业格局将是“三、二、一”。主导要素是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决定性或是特殊性作用的一种要素,它既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又是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标识。因此,不难理解:①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走向集约,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主导要素的更替过程;③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是,经济增长将从有形要素推动为主走向无形要素推动为主,即从土地、资金、劳动等要素投入推动为主走向技术创新推动为主。这一轮主导要素的更替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伴随的另一个进程便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正在走向人力资本强国,这是技术要素取代资金要素作为主导要素地位的基础。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是一种收益率极高的资本,它通过人力投资来实现,其特点是其所有权无法转让和继承,而具有间接性、

高效性和迟效性。由于人力资本和知识产品具有溢出效应,因而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换言之,对其的持续投入可以持续稳定地提高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长期生产率。这种生产率的显著标志,是技术要素已经作为起特殊作用的要素,但其基础是发达的国民教育体系。

最后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层次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由产业结构的层次所决定。通常说来,以低技术含量为主体的产业,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反之,则是集约型的。这是因为,低技术含量的产业,劳动者从事的是一种粗加工行为的简单劳动,行为主体受教育平均年龄均很短。人力资源的粗加工必然导致物力资源的粗加工,所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是粗放型的。而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劳动者必须从事深度加工行为的复杂劳动,行为主体受教育的平均年龄均较长。人力资源的精加工必然导致物力资源的深加工,所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是集约型的。显然,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过程必然伴随着教育结构的转换,其转换的指向应当是适应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指向。此外,与之相互动的结构转换还应有投资结构、外贸结构、社会结构、就业结构及公共权力结构的变迁。

二、要从不同视角判断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是多种因素的函数,其影响的视角判断也具有多样性:

一是资本机制形成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经济的粗放型增长与经济的集约型增长,其本质区别是资本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发挥程度之差异。资本机制完整地理解,应包括资本积累机制、资本信用机制、资本竞争机制和资本增值机制等(文宗瑜,1997)。资本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影响之一是资本积累机制。迄今为止,我国的企业类型之中,仍然是国有企业占据了不可小视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本所有者缺位,导致资本投入的低产出,严重制约着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效率。自建国至“七·五”期末的30年间,我国的全部国有资产只有16500亿元,还不及“七·五”期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累计投资的19764亿元多。“八·五”期间我国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3万亿元,但到“八·五”期末,国有资产总额才近4万亿元。资本积累机制之所以建立不起来,其源盖出于企业经营者在对